

第四章 媒体

在上一章做观点小结时，我对当今社会因为网络而经逐渐形成的**同温层社交**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但这种同温层现象的形成，除了人们自身的社交心理与网络所产生的反应之外，我们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方式也是非常主要的因素。

从古至今，人们对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方式一直都有很好的总结，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古代，由于信息基本靠口耳相传，传播速度慢，且容易误传，读万卷书往往不如行万里路。而且，古时信息量也小，对于书上所读做点亲身查证也不是太难，所以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被教导“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书人最忌讳的就是纸上谈兵。

但到了最近两三百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一直发展到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距离越来越长，获取第一手信息也越来越容易。这大大降低了信息被误传的客观因素（当然，主观上的恶意谣传不在此列），我们手中读物的可信度理论上应该是可信任的。而且现代社会信息量巨大，即便想亲身求证，也分身乏术，不太现实。

于是媒体的出现成为了我们进入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在西方社会里，媒体的地位甚至上升到了除行政、立法、司法外的第四权。媒体对于现代人有多重要，由此可见一斑。但媒体到底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呢？互联网给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这就是笔者在本章希望探讨的问题。

4.1 媒体的本质是炒作

毫无疑问，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如今人们做判断的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于媒体所提供的消息，人们对待媒体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舆论走向，舆论走向又会进一步影响市场需求、投资信心以及政治走向。要想真正理解这种影响力，就要先来讨论一下媒体的本质。接下来，我打算再以韩寒的代笔疑云这个事件为切入点来展开这个讨论。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这个事件是我见过的最荒谬的网络争议之一。这其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对于“无罪推定”和“人不必自证有罪”这两个基本原则的违反，关于这一点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由于这两个原则严格来说都属于刑事诉讼上的原则，在法律以外的场合，遵守这两个原则只不过是道德问题。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在指控或者质疑韩寒有人代笔的一方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之后，韩寒一方是完全可以选择不理会的，因为即使在法律诉讼的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对这种似是而非的指控或质疑做任何“自证”的动作。

但这个事件所凸显的更大问题就在这里，正是由于提出指控或质疑的场合并不在一个法律途径上，而是在一个媒体环境中，出于维护公众人物的名誉（有时这类名誉背后还附着巨大的商业利益），韩寒才反而不得不做“自证”动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常常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吗？有人胡说八道，自然会谣言止于智者。很遗憾，这些道理在媒体的“炒作”之下是无效的。因为所有寄希望于“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或“谣言止于智者”的逻辑都是假设在媒体环境中，言论也能遵循某种自由竞争的机制而实现**优胜劣汰**。但事实上，这种假设远没有大家相信的那么想当然。因为要想实现自由竞争必须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由市场来主导投入、产出、消费这三者之间的联动。第二，要由法律来确保自由竞争的公平性。媒体言论符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呢？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市场机制。

关于**市场主导**，众所周知，要想在媒体环境中实现自由竞争，我们就必须要允许胡说八道，否则用于甄别胡说八道的任何机制都会导致某种统一的对错标准，这将毫无自由可言，而从理论上来说，自由也是一个社会能有活力的必要因素，一个商业环境要想有竞争力，就必须允许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劣质公司成立。一个科研环境要想有创新能力，也必须允许每天有大量的看起来极为荒谬的项目成立。然后，市场机制会让优秀的存活壮大，劣质的淘汰死亡。理论上，媒体也该遵循这一规律，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我们其实不用担心胡说八道的主要依据，因为他们深信这些胡说八道会被自由机制淘汰。

但这一切只是理论。在这里，我们必须问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媒体所产出的内容属于资本市场的商品么？有人说，报纸，电视都是商业运作啊，它们遵守市场规律啊，可是，报纸，电视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投资商，并非来自于消费者，它们与消费者唯一的关系来自于报纸的发行量和电视的收视率。当然了，很多人会说发行量和收视率不就是市场的机制吗？谁会投资没有人看的媒体呢？这就关系到了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发行量和收视率是否影响着媒体质量的优胜劣汰？首先，投资商投资一个媒体肯定不是因为他喜欢媒体的言论，企业只是想依靠媒体的知名度来卖他自己的商品，政治，环保团体更是有更明确的舆论目的，它们只会更限制媒体的言论取向。也就是说，如果媒体能够优胜劣汰，靠的是消费者的辨识能力，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说政治了吧，就看看娱乐界，发行量和收视率最好的难道不是这些热衷于炒作韩寒是否有人代笔的八卦媒体么，所有严肃的电影，音乐评论只能活在这些信息的夹缝中。特别是网络媒体兴起之后，真正的优质媒体几乎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事实上，目前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速食化、媚俗化、民粹化，呈现出来的恰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

这很让人意外吗？仔细想想我们能依靠什么呢？消费者的道德吗？试问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公众人物，电视上、网络上、报纸上都在炒作我跟哪个女性朋友有一腿，你会不信吗？你十之八九会信的，这与你的道德无关，这是人性与群众心理的问题，无论我们教育到什么水平，这点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指望法律吗？**说真的，八卦谣言打击人的效果通常只需要一个礼拜，甚至某些政治目的的谣言，只需要选举日当天起作用就行了（例如陈水扁那两颗子弹）。而法律程序则通常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就算受害者赢了，这些媒体公司也通常都备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专项资金来支付诉讼和赔偿的费用，只要传播谣言的目的达到了，它们才不在乎这些钱，谣言达成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远大于这些钱的损失。而且，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个赔偿也没有意义，谣言造成的身心伤害是这些钱永远无法弥补的。事后，公众也不会在乎受害者有没有被平反的。况且在互联网上，平反信息的传播速度常常不到谣言传播速度的万分之一，这还是人性和群众心理的问题。

那么，法律能因为传播谣言而关掉媒体公司吗？那这又涉及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了，这是知识分子们最在意的议题之一了，对他们来说，自己能表达“质疑”的权力，比谣言会造成怎样的伤害重要得多（不然他们怎么像“质疑”韩寒一样，党同伐异，胡说八道呢？是吧？）。但我们要问的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媒体的反淘汰有没有危害呢？在民主体制下，媒体的反淘汰会产生各种情绪化、非理性的言论，这些言论会盖掉正确的信息和讨论，从而影响投票结果（譬如英国的脱欧公投），投票结果进而会影响到政客的素质，政客素质又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请看台湾地区）。在非民主体制下呢？问题更严重，媒体的反淘汰所带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因为无法通过选票释放，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这个压力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媒体的本质就是炒作。它的自由与否并不是保障知情权的关键，保障知情权的关键只在于我们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克服从众心理，摆脱群众惯性的能力，时刻警惕着媒体和主流舆论的导向，谨记爱伦坡说的这段话：

“媒体通常只会制造骇人听闻的话题，而不想挖掘事情的真相，即使媒体有时挖掘出了真相，那也只不过搭了炒作话题的顺风车罢了，纯属偶然，不必把媒体看得太崇高。”

4.2 互联网之下的新闻自由

在解释了媒体的本质是炒作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韩寒代笔疑云这个事件上来。很显然也很悲哀，质疑韩寒代笔的一方选择了媒体炒作，而且使用的还是类似于文革时贴大字报那种形式的网络炒作，性质更为恶劣。这说明了他们一开始就不想要事情的真相，打假压根就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只想利用人类的八卦天性攻击别人，让大家宁信其有而议之，从中获取自身的知名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身也是一种造假行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人有意选择了一条不让真相清晰的路，却从中牟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否值得为了打击几个假偶像人物，就鼓励炒作这种以攻击别人为主，疑人偷斧式的新闻，甚至是假新闻？这会让我们社会更有诚信，更进步吗？

事实上，假新闻历来有之，只不过在过去，新闻是由传统媒体机构来发布的，这些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制衡，形成法律。但如今这种相互制衡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网络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开发布信息，这样一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之间已经没有了界限。换言之，每当我们指责一个媒体在新闻自由上过了界的时候，这个媒体都可以说它的消息来自于某个个人的网络自媒体，或者社交网络账号。如果要处罚其信息来源，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干涉了言论自由，现

行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体系根本无法应对这种情况。而要重新完善这个体系，势必要重新定义言论自由的边界，这注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这场争议将带来非常激烈的社会对抗，每个人都会陷入其中。

无独有偶，海峡对岸的台湾这段时间关于网络假新闻的讨论也非常多，我没有兴趣讨论民进党当局抛出这个议题是什么目的，在出了那么多用行政权力干预选举的铁证（譬如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干预选举的丑闻）之后，如果有人还对这个政党的民主素养保有任何期待，我除了同情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但关于网络假新闻这件事，我还是应该恭喜一下台湾人，他们这次总算跟上世界潮流了，现在整个世界确实都在思考网络假新闻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例如，美国人这几年一直在说俄罗斯干预了它2016年的总统大选，其主要根据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宣称俄罗斯政府在海外买了很多Facebook和Twitter的帐号，制造不利于希拉里的消息，意图使其不当选。再例如，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也因为太多特定的知识分子利用传统媒体之外的发言系统传播了许多被过分夸大的移民问题，把民众对经济的不满导向了移民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怪错了人，问题根本不在俄罗斯政府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垃圾政客，他们只是和参与炒作韩寒代笔事件的那些人一样选择了网络，这是流氓行为没有错，但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群众太好骗了！**

当然，不要误会，当我说“群众太好骗了”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你们每个人都很好骗**，而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在作为群众的时候是很好骗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再举一个自己作为群众时被骗的例子吧。在我撰写本章初稿的那段时间里，电影院线上正在热映《流浪地球》这部科幻片。由于各种原因，我没能及时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但作为一个科幻迷，肯定少不了要关注这部电影。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网络上的媒体会成为我了解这部电影的主要渠道。由于我没法作为个人去亲自判断，而网络媒体的内容是面向社会大众来设计的，所以我的角色自然就成为了一个“群众”。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是电影的宣传方一直在鼓吹的主题叫做“中国的第一部硬科幻”、“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还好，典型的传统商业宣传手法，虽然利用了部分中国人自信心不足、急需肯定、好大喜功的心理，但并没有背离事实，毕竟这确实是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只不过把这个作为最大卖点来宣传，本身就说明相关方面对电影的内容是信心不足的，但这个商业宣传确实很成功，**群众**买账了，去看的人不少，而这种现象也确实加深了我想去看这部电影的欲望。

接下来的发展是，开始有些影评说电影的内容充满了民族主义，中国人至上的内容，然后就引起了各种“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电影里说自己强”、“好莱坞也是美国人拯救世界”之类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豆瓣评分上的各种情绪性灌水。一夜之间，这好像不是一部科幻电影，而是一台主打意识形态的样板戏。换言之，是喜欢民族主义和讨厌民族主义的人成了主角，我们这些喜欢科幻的人反而被遗忘了。这种氛围导致我最终放弃了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但这件事最糟糕的地方还不是他们把一部科幻电影意识形态化了，而是这些人说的根本不是事实。后来在优酷上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这是一部讲究国际合作的电影，无数细节都在告诉观众，有无数其他国家的人同时在做与中国人相同的事情，只不过镜头在中国人这里而已，电影里甚至国家的意识都很单薄，地球上已经是一个联邦概念了。这部电影的民族主义不仅不是事实，而且与事实恰恰相反。那些影评在干什么，我们这些群众又在吵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质问，那些人在干什么？他们没有看过电影吗？他们故意挑起不存在的争议么？他们是夹带私货，借题发挥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回避不了“群众太好骗了”这一事实，不是吗？显然，我作为群众而不是个人的时候，被骗得结结实实的。而至少在评论这个电影的议题上，他们的讨论是相当自由的，这导致了所谓的“优胜劣汰”的效果了吗？很遗憾，恰恰相反，媒体不但没有给我真相，还掩盖了真相。

所以我们要明白，在过去，言论自由或许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媒体控制在社会精英手里，他们能引导出主流舆论，虚幻出一种群众中存在共同智慧的假象。但以后就未必了，社会精英在在失去对舆论的绝对影响力，舆论正在越来越碎片化，民粹化，情绪化。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将会不存在主流，多种意见将会势均力敌，他们将谁也说服不了谁，并且相互无法容忍，对抗螺旋将会逐步升级，这样发展下去，言论自由带来的是社会分裂，这很可能会成为民主制度崩坏的原因。总而言之。我们在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当“民智”这个概念幻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一帮喋喋不休、各说各话的乌合之众，面对他们的愚蠢，他们的暴戾，面对网络暴力，反智风潮，卖弄颓废。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迟早要找出答案，否则人类迟早将孕育出比纳粹更可怕的东西。

4.3 社会心理学中的乌合之众

幸运的是，我并不是第一个胆敢说“群众太好骗”的人，著名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就对群众心里的特征做了详尽的分析，他在书中明确指出：

当一个人是个孤立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之后，他所有的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会被这个群体的思想所占据。

根据《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的阐述，我们可以将群体心理所导致的行为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 **行为冲动多变**：当面对困难和危机时，群体的情绪通常会压倒个人理性，让群体中的个体陷入莽撞的行为模式，冲动易怒、拒绝思考，最终被“无名氏”的群体所裹挟并利用，让其往东就一并往东，改日若让其掉头往西，亦会不假思索，立即一并往西。
- **思想易受影响**：群体中的成员之间还会通过彼此暗示、情感传染等行为加强无意识个性的表现，驱使人们将接受到的思想暗示外化为自身的行为趋向。
- **情绪夸张而单纯**：虽然群体中的个体表达出来的感情各有不同，但他们普遍都表现得极为简单、狂热、虚妄和荒诞。
- **意识偏执而专横**：群体中的给他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从众心理，这种心理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匿名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个体常常会借助“数量即正义”之名行不负责任之事，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这是最易滋生出如教条主义、形成思想僵化的一种偏执心理。

能体现以上这些群体行为特征的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战争，很多研究结果都在说明，一个平日里温柔体贴、富有同情心、连只蚂蚁都不会轻易伤害的人，到了战场上不仅会跟敌人杀红眼，还会在占领区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因为这时候他只是军队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游行示威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平日里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孩子，到了示威集会的地方，不仅会和警察激烈对抗，还往往会参与各种打砸抢烧、残害无辜，因为这时候他只是示威群众的一部分，甚至还是“伟大的”示威学生的一部分，虽然我一直闹不清楚“学生”这个群体的名号“伟大”在哪里。

请静下心来，我们不妨仔细看看这些群体，他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弱智。譬如，参与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在敌国残害平民是保家卫国吗？参与游行示威是为了反日或者抗议，打砸抢烧别人的私有财物是反日和抗议吗？再譬如，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民众普遍将整个穆斯林群体置于口诛笔伐的境地，而忽视了大部分穆斯林都是善良的，欧洲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相安无事的生活了很多年。这还让人想起了当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为了追求自由和理性，然后他们用断头台对付“自由的敌人”，到底谁是自由的敌人呢？在我看来，当你为了自由，加入了一个靠简单口号行动，不独立思考的群体，你就成为了自由的敌人。别忘了，有多少罪恶以自由之名而存在。

换言之，就是当我们作为某个群体而存在时，通常就会变得情绪化、盲从、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显得智商低下。这时候，“群体”就像一头活生生的怪兽，而我们只是这头怪兽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大众媒体就是针对这头怪兽来设计内容的，而设计它的却是一个个被叫做知识分子、商人或政客独立个体，他们不仅智商处于正常状态，还具备驯服“群体”这头怪兽的所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这种优劣对比是一目了然的，只要我们让自己作为“群体”而存在，想不被骗都是一种奢望，几乎不可能做到。

当然，有些事情虽然可能是事实，但将它直接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譬如，当我说“群众太好骗”、“民智这个概念不存在”的时候，挑战的是很多知识分子多年来笃信的政治信念。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但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说明的那样，作为一个“黑客”，我更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这些人的“信仰”。毕竟，总有人跳出来提醒大家“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它连太阳系的中心都不是”、“自己去读《圣经》吧，别听罗马那帮神棍胡扯”这样的话。毕竟，这些政治信仰的前提看起来并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那么不言自明。而对我来说，事实的地位永远在信仰之上，任何不基于事实的信仰，都是虚幻的。

4.4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如果你以为一群很好骗的乌合之众面对一个个熟悉社会心理学的媒体内容提供方已经很可怕了，那我应该恭喜你，你总算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了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其实还好，因为这种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自从有媒体的那一天起，它就存在。由于社会心理学并不是一个可精准计算的工具，它是基于统计概率的，这意味着媒体的设计质量，也就是它引导（或者说欺骗）群众的能力取决于它能收集的数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种数据的收集只能靠一

种叫做“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进行，无论这种方式采用的是电话还是问卷，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数据是相当有限的，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能力。换言之，这些人在设计媒体内容的时候，还未必能知道群众此时此刻喜欢听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实现最佳的引导效果（或者说欺骗效果）。

要想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他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实现**全民监控**。但实现全民监控不仅需要强大的技术能力，还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说实在的，如果想自上而下实现全民监控，恐怕没有一家公司和政府能够做到，除非真的出现《1984》里那样的世界，全世界的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了三个巨大的国家里，并且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思议地完成了那种长期稳定的集权。而《1984》、《美丽新世界》这类书会出现以及它们的屡禁不止，本身就说明了对政府的警惕，这种集权即使会出现，也长久不了，即使强如纳粹和苏共，也维持不了。

但全民监控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自下而上的，让群众自己提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將这种数据分享引导成一个游戏，一个有商业利益的游戏，一个充满了时尚元素的游戏，一个满足八卦心理的游戏。这样就有了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么？当你在Facebook message上跟人说到头痛之后，Facebook上会多出很多头痛药的广告。你用淘宝的时间越长，淘宝上出现的广告就越能引起你的兴趣。你买的外卖越多，外卖app的推荐就越了解你喜欢吃什么。想想看，当他们知道你平时说什么、买什么、吃什么的时候，他们会不知道你喜欢听什么，该如何引导你吗？

可能是时代限制了奥威尔的想象力，在《1984》那部小说里，至少政府的监控还需要强迫所有人都安装一个大屏幕，而这种强迫感至少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被监控，他们还能躲到野外去，或者摸索监控设备的死角，无论躲起来是为了讨论问题还是做爱，至少，至少他们还知道问题的存在，并选择是屈服还是反抗.....我们觉得这样很恐怖？来看看我们自己吧！我们现在主动上传自己的GPS信息，主动提自己的政治观点、购物习惯、兴趣爱好.....甚至自拍裸照和做爱视频，然后放在自以为很安全的服务器上。啊，当然，我们一定会再加上一个自以为很安全的密码，顺便把自己的指纹，虹膜信息也一并给了别人。

当然，当然，我们的数据是给微软、亚马逊、Facebook、Google、Apple的，他们不是政府，而且他们有一个号称支持民主自由的政府。但这能说明什么呢？你今天所了解的大部分反人类罪恶都是民主政府的公司做的，记得吗？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干了什么？美国的黑水公司干了什么？而且，你真的确定他们不会给政府我们的数据？是啊，这是自由世界的公司，有法律。看见没？是不是CNN告诉你“Apple拒绝了一次FBI”，然后你思考就停止了？忘记了斯诺登，忘记了维基解密，忘记了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说服自己的。拜托！政府如果真的想让他们交数据，CNN是不会告诉你的，他们就算知情也只会拿这个去威胁这些公司，将数据也分享给他们，他们只会告诉你现在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如果此刻没有人记得斯诺登和维基解密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我们的数据已经在政府手里了。

我们警惕政府的权力，但你警惕过那些跨国公司了吗？你警惕过自己的电话和电脑了吗？现在，即使你身在美国，你敢说你看到的信息是自由的吗？你是有自由意志，没有被洗脑的吗？还是我应该像《黑客帝国》里的莫菲斯对待尼奥一样，告诉你“欢迎来到真实世界”，恩，还是你想回到matrix里呢？

4.5 观点小结
